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决策参考

2022年第6期（总第9期）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编

2022年12月

专题一：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	1
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驱动机理、实践路径与成效表征（摘选）	1
数字化转型与浙江职业教育模式变革	11
专题二：高职院校助力区域发展	16
地方高校何处去——基于校地关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摘选）	16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成效与推进策略 ——基于长三角41所学校校企合作中期建设进展的分析（摘选）	22

专题一：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

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驱动机理、实践路径与成效表征（摘选）

刘仁有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数字中国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是职业教育主动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变革教学和评价模式，创新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其核心是基于数字技术系统性创新发展过程，旨归于重塑职业教育未来发展全新样态。目前，已有学者在关注数字化时代职业院校“三教”改革、专业数字化升级改造、教材和新型教材建设、实训基地建设，也有学者对数字化背景下高职院校“智慧课堂+MOOC”混合教学模式、高职院校英语教师职业能力提升、思政体育课程改革等进行了探讨，拓展了职业院校数字化的认知和视域。但是对职业院校因何需要数字化转型、转型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理念为何、实践中如何推动转型、以何标尺检验转型成效等方面，还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探究。

一、现实之势：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内外因素论指出，事物变化发展受内外因素综合影响，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探究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深层动因，有必要从外部驱动、内部机理两方面综合把握。

（一）从外部来看，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和教育变革驱动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

一是国家政策有部署。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延伸和升级，梳理职业教

育数字化政策，有必要追溯到职业教育信息化。梳理近十年国家相关政策可知，部署频次越来越密集，内容越来越系统深入。一系列政策部署和项目行动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

二是经济发展有要求。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我国数字经济将迈向全面扩展期，各行各业的布局调整和转型升级将不断提速。行业产业的急剧变革也将给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新的命题、新的要求，职业院校有必要推进自身转型升级，服务创新链、产业链和教育链有机深度融合。

三是教育变革有趋势。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发生过三次教育革命。前三次教育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自的突破，但教与学的基本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接下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带来第四次革命，这将给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带来全面的、根本的、颠覆性的变革。作为实施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职业院校要在数字化时代存续发展，理应顺应职业教育变革趋势，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让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跟上数字化时代发展需要。

（二）从内部看，生存竞争、规范管理、个体发展要求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

一是生存竞争的需要。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是教育信息化中的薄弱环节之一，起步比较晚，投入长期不足，在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大力推动下，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职业院校信息化水平和能力明显滞后于数字化时代，如：骨干网络装备落后、硬件设施设备过时、干部师生数字化意识落伍、数字化教育资源有待充实、数字化应用能力欠缺等，既落后于国内的普通教育，也落后于欧美日韩等国的同类教育。要

在数字化时代生存，甚至塑造未来竞争优势，职业院校必须尽快尽早布局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积极抢占数字化时代发展先机。

二是规范管理的需要。规范管理是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数字化具有共享、在线、连接、智能等特征，有利于更新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的数字化思维和观念，提高数字化应用综合素养；有利于密切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联系，便于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学校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事务，真正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促进职业院校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管理流程，创新积分制等公平、科学、有效的绩效管理机制；有利于职业院校革新督导评价模式，强化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

三是个体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趋势和生产生活要求，让个体越来越迫切地期待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更关注个体需要、更适合个体发展、更能激发个体潜能，冀望职业院校提供更丰富、更多元、更优质的教育服务，而数字化技术为汇聚海量资源、丰富应用场景、促进教育均衡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和保障。

二、内涵之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包括育人、应用、资源和安全等要件

（一）育人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根本

众所周知，立德树人是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信息生态理论也指出，教育数字化的核心并非技术，而是数字化赋能教育，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职业院校抢抓机遇，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遵循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紧紧围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线，一方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根据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发展阶

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为主、市场参与的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另一方面构建以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育测量与评价体系，推动实现职业院校办学模式、教育形式、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转型，变革理念、变革思想、变革方法、变革实践，培养具有数字化思维和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应用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核心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应秉持“应用”的理念，坚持“应用为王、服务至上”，以教育教学实际需要为牵引，服务教学、服务教师、服务学生、服务考核评价、服务行政管理，以应用统领数字化教育各项工作。

（三）资源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组织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资源是组织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根本。职业院校要增强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需要聚集充足数量、更高质量的数字化资源。因此，推动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要树立资源为要的理念，盘活存量、拓展增量、提高质量，积极汇聚优质数字化资源。

（四）安全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底线

从安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安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也是数字化的基础。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理所当然地需要坚守安全底线，安全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红线底线，失去安全就好比没有“1”的“10000”，再多的“0”也都没有意义，必须始终绷紧数字化安全这个弦，建立健全“谁主管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网络安全责任制和问责机制，分级管理、分级负责、自主防护，压实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安全责任。

三、实践之式：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需要主体、客体和媒介同

向发力

人类的实践活动基本由主体、客体和媒介三要素组成。作为改造职业教育生态的客观活动，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实际上也是一种变革实践。探寻其实现路径，理当从主体、客体和媒介这三要素着手，革新教学主体、升级硬件客体、完善治理媒介，推动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数字化的智慧学习空间。

（一）推动教育者、学习者和管理者等主体数智化变革

职业院校办学实践的主体包含教育者、学习者和管理者。实践主体是实践的主导因素，因此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推动各主体全面、根本、颠覆地实现数智化转变。

一要促进教育者由“传授者”向“指导者”转变。数字化转型升级要引导教育者学会做数字化做不到的事，从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两个方面均衡用力，完成由“传授者”向“指导者”的华丽转型。职前培养方面，要实施教育者数字化培养行动，改造职业教育教师学位教育、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等传统培养路径，培养一批具备“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知识框架的教育者。职后培训方面，要实施教育者数字化培训行动，通过组建教学创新团队、在线培训、教育者个性化培训、教育者微培训、教育者学习共同体等多渠道多路径，持续提升数字化时代教育者的学习、实践、反思与改进能力。

二要适应学习者由“同龄”向“混龄”的转变。数字化时代，学习者愈来愈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将令学习者的年龄、地域、基础、文化背景等结构都将呈现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从“同龄”变成“混龄”。数字化转型升级要适应未来学习者由“同龄”变“混龄”的趋势，改变大班学习、统一课程、统一难度、统一进度的传统学习模式，利用数字

技术开发智能教育助理，建立智能、快速、全面的职业教育分析系统，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新型学习空间，为学习者提供精准推送的职业教育服务，实现日常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定制化。

三要引导管理者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数字化时代，职业院校管理者要更多地关注如何调整自我来提高组织整体协作水平，努力改变传统的层级管理体制结构，改变内部管理方式和决策方式，改变组织的业务流程、管理流程及内部协调与控制机制等，打破组织内部传统的等级制度与职能部门间的界限；要努力从单一的行政决策到转为“多方参与、多维联动”下的多方科学决策，从“金字塔”式传统模式转为“扁平化”精简高效的现代管理模式，使职业院校的管理更加自主化、开放化、民主化、科学化，更好地遵从职业教育教学规律。

（二）推动校园、教室和实验实训室等客体现代化升级

职业院校办学实践的客体主要有校园、教师、实验实训室等几种类型，办学客体是职业院校办学活动的前提基础。数字化转型理应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学校、教室、实验实训室等的现代化升级。

一要促进未来校园由集中到泛在。需要把握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借助新一代信息化技术，推进职业院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建设一批示范性信息化标杆校，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技术环境，跨越围墙、跨越社区、跨越城市、跨越地区构建一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泛在学习空间，支持未来学习者大规模个性化学习。

二要促进未来教室由封闭到开放。要以“智能化”的全新理念为引领，聚焦职业教育学习者学习能力、社会能力、创新能力提升，创新完备、多维、经济的学习环境。“完备”指未来教室不仅要直接的教學環境進

行建设，还要对间接教学环境有所考虑；“多维”指未来教室应该可以灵活地分割空间以适应各种教学活动的要求，并且兼顾了合作性和便捷性；“经济”指未来教室的建造应该将多功能集成在一个单元内，随时可被分割成多间报告厅、讨论室或教室。

三要促进未来实验实训室由实体到虚实结合。建设未来实验实训室，既要虚实结合，融合信息技术和实训设施，提升数字化、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实训教学中的应用水平；又要一校一策，结合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实际需求与区域经济和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将未来实验实训室建设与学校智慧校园整体设计相融合，面向区域、面向行业、对接产业，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要共建共享，在尊重保护院校和企业知识产权与资源版权的前提下，保证未来实验实训室优质资源的开放共享和持续应用，提高其利用率和应用效益。

（三）推动理念、教学和评价等媒介数治化转型

在实践活动中，媒介是各类工具、手段以及运用的程序方法。就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而言，其媒介涉及理念认识、教学改革和考核评价等方面，需要树立“信息化”理念认识、推进“数字化”教学改革、实施“多元化”评价，革新职业院校治理体系。

一要树立“信息化”理念认识。数字化时代，需要职业院校树立“信息化”的全新理念，聚焦学习者学习能力、社会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建立起灵活个性、开放终身的全新体系，培养出多样化、个性化、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

二要推进“数字化”教学改革。紧随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开发以实带虚的纯虚拟资源、以虚助实的模块化资源、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资源，尤其要注重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善用新媒体、新技

术、新形式，构建知识技能与人文素养双融合的虚拟仿真资源体系，培养人机合作的能力，增强新一代信息技术背景下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另一方面要革新技术技能人才的教学方法。以“云课程+智能技术+虚拟现实”为主的教育手段新组合，变革 20 世纪初巴甫洛夫等提出的“训练—知识检验—训练”的传统模式。

三要实施“多元化”评价。评价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一直受到教育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数字化时代，职业院校要依托数字化技术，搭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生、教师、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职业院校评价的平台，实现评价主体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要全过程记录学生的学习表现，帮助学生找出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出问题的根源，并针对地提供指导与帮助，实现评价结果运用从“重分等”向“重诊断”的转变。

四、进阶之视：通过“教、学、管、评”环节可以检验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效

完整的教育教学活动过程包含“教、学、管、评”等基本环节。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归根结底是要服务教育教学，理应通过“教、学、管、评”四个方面的转变来评判成效。

（一）教导差异化是成效评价的核心指标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设计者、实施者和组织者，对学生的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等具有教育影响。审视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效，要从教导的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要看职业院校是否加快教学、实训、管理、服务等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按需配备高清互动、虚拟仿真、智能感知、数据采集等硬件设施，打造具有良好体验的技术技能现代教学环境；另一方面要看职业院校是否从教师“备、授、批、辅、

练、测”六环节着手，以数字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有效模式，支撑选课走班、校际协作、校企协同等灵活开放的教学组织模式，务学生差异化培养和协同育人。

（二）学习个性化是成效评价的关键要素

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体验者。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发展是通过自我设计、自我构建、自我努力实现的。因此，评价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效果，既要看到可及性，又要看到有效性。可及性要求坚持“需求牵引、应用为王”的原则，搭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有效汇聚易用好用的优质资源；搭建学生学习与交流平台，为学生提供全过程、智能化、个性化服务。有效性要求运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探索网络化、沉浸式、智能化的技术技能学习应用新场景，开发智能学伴、智能助教等新应用，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加适切的资源和服务，最终服务学生更自由、更个性的“学”。

（三）管理智能化是成效评价的显性因素

管理是组织不可缺少的要素。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的关键是对数据的采集、分析、挖掘和利用。因此，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点就是要提高数据的处理能力。既看职业院校是否敏锐把握数据驱动的治理新趋势，通过编制“数据字典”等，构建数据标准，畅通统一、安全、便捷的数据交换通道；又看其是否构建数据大脑，在数据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数据采集、分析、挖掘等能力；也看其是否构建内部“数治”机制，依托职业院校海量数据，推动管理业务流程再造，提高管理服务效率，支撑战略规划和科学决策；还看其是否构建数据共享机制，促进政府和学校数据共享，实现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数据共享，实现校内外业务协同、教育服务一站办理。

（四）评价科学化是成效评价的隐性因素

评价是职业院校的指挥棒，事关职业院校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衡量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办教育既要“向内看”，也要“向外看”。“向内看”就是要看职业院校是否在教育教学评价中有突破，即是否通过开展伴随式数据采集，探索建立符合职业院校学生特点的个人发展档案，创新多维度、差异化的评价工具，支持学生“理论·技能·态度”全过程纵向评价和“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探索建立职业院校教师评价模型，为不同专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客观“画像”；探索课堂教学效果即时反馈机制，及时准确生成课堂效果分析报告。“向外看”就是要看职业院校是否在考试招生评价中有突破，即是否在课业考试中，扩大线上考试、线上技术技能测试比例；在招生考试中，选择有基础、有条件、有意愿的二级教学单位或专业领域，探索规模化机考、无纸化招考改革，丰富招生考试方式。

（引文出处：刘仁有.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驱动机理、实践路径与成效表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30):66-73.）

数字化转型与浙江职业教育模式变革 ——在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发展论坛上的报告

陈达

浙江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

教育数字化既是时势所趋，也是现实需要。数字化转型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动力。浙江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化变革和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新《职业教育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重要政策精神，协同推进全省数字化改革方略，积极探索实践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路径，扎实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工作，努力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浙江样板。

一、浙江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实践进展

2021年，浙江省委全面部署全省数字化改革工作。同年，省教育厅制定印发《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方案》，实施“教育魔方”工程，按照“综合集成、整体智治”原则和“教育大脑+智慧学校”思路，统筹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管理、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教育新基建、新模式、新格局和新生态建设，不断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是教育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浙江以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按照“需求牵引、应用为王、成熟先上、技术保障”工作原则，积极构建“大脑+应用+服务+机制”的职业教育数字化深度融合浙江模式，自觉扛起推动现代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重大责任，深化提高效率、改善效果两大任务，拓宽增强大数据平台、推广特色应用、创新有效机制的

发展路径，在行业发展、社会评价和政策要求相统一的原则下，努力开创数字化职业教育的新局面，培养更多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一）构建职教大脑数字底座

“教育魔方”是浙江省教育厅依据教育公共服务行业特征，面向全省所有学校和教育部门设计开发的教育数据感知、共享和计算的基础支撑系统，贯通政务云和各级教育数据中心，并打通浙政钉、浙里办、浙教钉等各类终端，承载省级统建应用、区域学校自建应用等，为教育行政管理者、各级教育局、各类学校以及公众提供数字化教育服务。自 2021 年 11 月上线以来，“教育魔方”初步实现了业务应用一云支撑、教育数据一仓归集、信息安全一网统管、线上线下一码畅学、数据治理一屏呈现、创新应用一站可选，为教育领域高效管理、精准教学、泛在学习等创造了良好条件，为职业教育决策大脑系统和决策支持中心建设奠定基础。

（二）建设与应用职教特色教学资源

组织职业院校教师基于全省网络学习个人空间建设共享专业教学资源，实现众智共享专业教学资源。组织名师集中开发名师金课、名师教研等示范性优质课程资源，推动建设数字化、融媒体教材，实现名师共享优质示范资源。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活动，实现共享教学生成性资源。组织校企合作开发前沿技术、技能培训等真实项目资源，实现共享企业前沿资源。继续面向量大面广的专业课分级遴选一批在线开放课程，创新政府购买优质教育资源服务机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推广应用、优化与持续迭代。

（三）打造职教特色服务场景应用

打造双师型教师培养网络服务应用。通过创建“1+10+N”的名师和技

能大师网络工作室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组建教学团队，发挥传帮带作用，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及时纳入教学，将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内容及时融入教学，推广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广泛应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打造个性化网络学习服务应用。依托之江汇教育广场，构建了支撑全省一人一空间的职业教育教学的网络学习空间，提供空间服务、公共应用服务、数据分析服务，支持资源创建与共享、教学支持服务、学习交互服务、决策评估服务等公共应用服务。

（四）培育一批智慧试点示范院校与案例

通过国家、省级两级联动，开展智慧学校试点示范建设，加快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启动省级职业学校信息化标杆学校建设试点，发挥基层首创精神，从环境、应用、治理等维度推进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发挥试点的典型引领、以点带面功效，培育形成智慧实训新型空间、教学模式创新、学校整体智治等一批高质量有特色的数字化改革案例和经验，引领示范全省职教数字化改革。

二、浙江深化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思考

数字化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技术革命，需要理念、方法、手段、机制同时到位，需要重大应用多跨协同。在先行先试的同时，对于如何深化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浙江在且行且思，边实践边研究。主要是：

（一）要逐步发挥职教大脑的智治能效

建设职教“数字大脑”，构建人才立交桥课程体系建设、企业精准推荐、人才综合管理等应用，形成政、校、企间的数据互通和效率协同，服务精准管理决策、服务个体精准成长成才、服务校企深度合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高效智能化服务。

（二）要开展多跨协同重要场景应用

厘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多跨协同业务流程和业务需求，梳理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清单和需求清单，绘制职业教育产教对接谱系图，通过开设数字化相关专业和专业数字化改造，实现职业教育和产业人才需求精准无缝对接，增强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与行业产业发展的适应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人才动力。

（三）打造名校名师名匠“网红”

推动名校、名师、名匠“上云”，形成学校网络共同体、教师网络共同体、校企网络共同体，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打造专业品牌和特色社会服务，全面提升学生数字化思维和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职业教育形象，形成“职业成才选职业学校、技能提升找职业学校”的社会氛围。

（四）加强理论应用研究与机制创新

加强政策、制度和机制创新，开展人才培养全过程中新技术、新模式研究，调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主体的动力和活力，重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信息技术产品购买服务方式，建立职教数据共享与流动机制，构建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生态环境。

三、浙江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下步思路

浙江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试点省。我们将以整省试点工作为契机，按照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将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服务于提质培优，服务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健全数字化转型变革的推进机制，细化分工、建好台账，将责任传导到职教战线的“神经末梢”，把数字化转型变革的任务落细落小落地；另一方面，加强激励引导、强化制度保障，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扩大职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变革的总体效应。不断推动信息技术成为破解职业教育难题的浙江解法，数字赋能技能人才培养，推动浙江职业教育走出数字化改革先行先试的坚定步伐，让职教更加“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奋力打造与“重要窗口”、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相适应的全国职教高地。

（文章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

专题二：高职院校助力区域发展

地方高校何处去 ——基于校地关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摘选）

蔡宗模

重庆文理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副社长

一、问题提出

地方高校既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在大学国家化之前，没有全国高校与地方高校之别，大学规模小，活动往往局限于一座城市，可谓“准地方高校”；在大学国家化之后，除了少数精英大学或重点大学，绝大多数院校都可以划归“地方高校”。地方高校无疑是高等学校的多数。对于高校来说，再地化就是再次（重新）地方化，“再”既指第二次，也有深化之意。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校管理重心的下移，就有人提出“高等教育地方化”。到了2010年，潘懋元先生还专门撰文，希望“高等教育加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联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时至今日，地方高校的地方化仍然面临理论和实践深化的困境。

在高等教育中，再地化属于校地关系范畴。这个范畴包括：去地化，在地化，重新在地化即再地化。校地关系由来已久，它经历了纯粹的空间关系、被动的合作关系和主动的服务关系这一过程的历史转变。转变的动因，来自于国内外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高等教育机构观念和行动的适应性选择。

二、地方高校校地关系的历史考察

结合政治、经济和科技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重大影响，我们将人类从早期活动到 19 世纪中叶这段漫长的历史统称为“早期全球化”，将 19 世纪末以来第二、三次工业革命驱动并由欧美主导的历史称为“当代全球化”，而将 21 世纪世界格局大调整之后并将由智能技术引领的未来历史称为“未来全球化”。早期全球化又可以细分为大学国家化之前和大学国家化之后两个阶段；当代全球化也可以细分为“旧全球化”和“新全球化”两个阶段。本论着重关注地方高校在长时段历史中的校地关系走势及其在新全球化背景下的应然选择。

（一）早期全球化背景下高校的选择

1. 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公元 11 世纪到公元 17 世纪）

在现代大学刚刚诞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由学者们自发集结起来的“行会组织”，处于教会势力和世俗王权的夹缝中，由于自身能量和社会影响有限，早期并没有引起两种对立力量的关注和青睐，因此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个时候的大学没有“地方”概念，甚至也不受国家疆界或教会势力的束缚，因为他们与地方之间并非相互依存，而是常常处于紧张或对立中。随着王权在与宗教势力的争夺中逐渐占据上风，大学被视为世俗政权维护统治的工具纳入资助并进行建制化改造，大学由此逐渐向体制化转变，从逐水而居的游牧民族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定居者。但它的存在本身既非源于某地，也不是为了某地，而是为了满足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中央政府）的统治需求，包括为其培养王位继承人、官吏、律师、医生等。所以此时的大学其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与地方并无实质联系。从精神层面上看，“王权大学”延续了学者行会精神自由的传统，说他们是“去地化”的存在也不为过。

2.现代民族国家之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

中世纪末期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历史第一次进入了一个遍地开办大学的时代。但是，这些新设置的大学几乎都是地方性大学。各邦领主设置并发展自己的大学并发布命令禁止本邦青年到外邦去上大学，在学术的领域内形成了防卫的、排他的体制。在大学寻求合法性的制度化过程中，“法治趋势”与“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大学顺应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代就开始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与政府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受到的控制也越来越强。总体来看，这个阶段大学作为民族国家的战略性工具而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虽然其普世性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得到了最大的彰显，但与地方之间并未有机结合，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非地方性”存在。

（二）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高校的选择

1.旧全球化阶段（19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

地方高校的地方化以服务为倡导，以美国赠地学院和各国多科技术学院的涌现为标志。旧全球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原来的国家化治理模式。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或强全球化才出现了。随着地方性学院的增多、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政府财力的削减，重点大学的全球化和地方高校的地方化同时凸显出来。在强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高校虽有地方化的外在要求和特色发展的内在需要，但全球化的超强吸引力和提供的巨大机遇，促使所有院校包括地方高校在地而不爱地、服务而不服从、共事而不共情，这就是“在地”而未必“化”的原因和现实。

2.新全球化阶段（21世纪初以来）

再地化，以融入为倡导，先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创业型大学探索，后

有中国的应用转型倡议与实践，校地关系发展的历史意志昭然。21 世纪以来特别是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上台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幅调整全球化政策，开始有针对性地收缩全球化阵营，全球化形势急转直下，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在重点大学继续冲击“世界一流”的时候，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地方、做实国内基础、探索“特色”发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广大地方高校的肩上，再地化问题凸现出来。在政府的财政分权逼迫、国家的意识形态诱导、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遗产的召唤、地方政府的劝诱和高校自身资源获取渠道多样化的动机引导和共谋下，地方高校或主动或被动收敛自己的全球扩张之翼，转而正视深度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之道。所以再地化之“地”主要跟国内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有关，而不是与高校所在的行政区划同一。当然，这个辖区很可能是某高校再地化的“圆心”。

三、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大学发展的长时段历史表明，在校地关系问题上，作为高等教育整体的一部分或特定历史阶段分化出来的一个类型，地方高校与其他所有高校一样，受着历史时段或社会局势的影响和制约，从而表现出总体一致的趋势。

（二）未来展望

再地化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地方高校皈依地方，唯地方马首是瞻，而是要求重新调整大学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将近代以来大学“走出象牙塔”的趋势进一步从“走近地方”“服务经济”推进到“融入本土”“合作创新”。这一过程充满了新与旧、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行政主导与大学自主、适应与超越等诸多矛盾冲突，国别不同，大学不同，阶段不同，

路径各异，情况复杂。但总的历史线索清晰，即大学首先是地方高校的“再地化”趋势已然明朗，势难逆转。事实上，有诸多概念担任过（着）“再地化”角色或预示着“再地化”这一历史趋势：创业型大学、应用转型、校企（地）深度合作、产教融合、普职融通、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四螺旋”等。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集中爆发式增长，新全球化不但要求地方高校主动作为，致力于一些新兴战略领域的研究，推动新兴产业的生长和发展，同时也让应用转型高校面临安于现状与突破定位的矛盾与困惑。

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高校既有再地化的要求，也有国际化的需要和可能。从长远来看，其先期重心在再地化，后期重心在国际化。再地化重在“扎”，即全方位的合作、渗透和交融，旨在获得足够的本土资源，并凝练大学特色；国际化重在“扩”，即关系的拓展、影响的扩大，进而形成大学品牌。从再地化任务来看，它将经历从适应到引领的转变：第一阶段，地方高校在形势的逼迫下反身转向，以知识服务和人才供给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重新审视并改变原有的组织结构，通过办学理念的转变、管理重心的下移、治理机制的完善、学科专业课程和师资结构的调整、评价制度和标准的改变等，不断自我更新以适应新的功能性要求。第二阶段，改变了的大学开始释放知识创新中心的巨大潜能，越来越有力地推动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特别是通过知识创新和人才供给，从根本上改变着地方的人口素质和文明程度，进而推动地方的“大学化”，即向知识社会的深度转型。第三阶段，地方高校以科教文艺引领社会并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改变了整个区域的风俗、风气和风貌，形成校-区一体格局，大学真正成为地方的知识中心、创新中心、文化中心，成为醇风化俗之源，所谓“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远古理想得以变成现实。

未来，取决于“新全球化”的持续时间和走向：其一，以两极对峙为特征的新全球化局势长期持续；其二，以收缩为特征的逆全球化局势形成；其三，以共荣为特征的顺全球化局势展开。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在政治、市场和学术三股力量的互相渗透、相互博弈、此消彼长中，我们相信，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终将让位于学术逻辑，或者让位于以认识论为主导的复合逻辑。因为探究精神、知识特性和认知使命，大学不但曾经穿越历史，也终将引领社会（科技、文化、思想等）、开创未来，并最终结束大学精神空间和行动空间分离的历史，弥合大学理性与大学实践之间的张力，摆脱长期被动适应或跟随发展的命运。彼时，“地方高校的再地化”将成为历史的过往，校地关系转换成大学与国家、大学与地区或大学与地球的关系。

（引文出处：[1]蔡宗模.地方高校何处去——基于校地关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11):59-68.）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成效与推进策略 ——基于长三角41所学校校企合作中期建设进展的分析 (摘选)

王安安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产学研合作中心主任、双高办主任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确保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助推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举措，高职学校校企合作水平与区域产业发展态势互为耦合。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颁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旨在推进建设一批综合实力强、改革力度大、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高职学校“样板房”，积累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和模式，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提升校企合作水平”作为十大任务之一纳入“双高计划”建设内容。迄今，“双高计划”实施三年有余，又恰逢教育部刚刚完成中期建设绩效考核工作，有必要也是时候总结与审视“双高计划”学校推进校企合作的现状和困境，为高职教育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提供策略建议。

一、长三角“双高计划”校企合作的阶段性成效

通过词频分析和内容编码发现，41所学校自评报告中都提及“长三角产业”“区域产业”等表述，其中8所学校超过10次以上，可知“双高计划”学校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与区域产业发展结合紧密，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高水平专业群布点和区域产业布局正向适应

长三角地区产业门类齐全，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综合竞争力很强；已经形成 14 个成熟的产业集群，前五产业分别为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现代金融、装备制造、生物医药。41 所学校共建设 56 个高水平专业群，分布在 17 个专业大类，覆盖面较广；高水平专业群布点最多的集中在装备制造、财经商贸、电子与信息等专业大类。“双高计划”专业群布点与产业布局耦合匹配，“双高计划”学校及时调整专业定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专业跟随产业转型升级调整的机制得到落实并趋于成熟。

（二）“国家—省域—学校”三层制度体系趋于成熟

继国家层面颁布多项深化校企合作的重磅文件之后，长三角在制度供给和本土创新上走在前列，省域层面先后颁布相关制度或法规。地市级层面亦有不少政策出台，并建立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推出专项督导举措，在跨界跨部门制度设计上不断突破边界。长三角“双高计划”学校因地制宜、因校施策，出台了校本制度或方案，促进校企合作机制更加有序。不少学校形成了特色模式，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首创职教集团“公司化运营”新机制，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形成“行业·校友·集团”共生生态办学模式，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建立“1+2+4”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构建“园区型”“工厂型”“公司型”“门店型”校企合作模式。

（三）跨区域高层次综合性平台搭建增多

长三角处于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所在都市圈，并在产教融合型企业、产教融合发展工程等项目遴选中表现突出，校企合作环境很好。四省市着力构建以城市群为载体的职教高地和改革先行区，并结合自身产业特

点和优势，打造了一批区域性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四）协同育人多主体参与全方位开展多举措推进

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长三角高职学校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从 41 所学校中期建设进展看，长三角校企协同育人至少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多主体参与，企业参与意愿增强。区域产教融合政策举措得力、产业基础强，校企合作已经从原先以学校为主体逐步向政府引导、多元主体转变，以企业为主体的校企合作不断增多。地方政策重点推进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二是全方位开展。不断强化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和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增加实习实训机会、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提高学生技术技能水平、扩展社会服务职能。三是多举措推进。除了牵头组建职业教育集团（联盟）等校企合作平台之外，长三角高职学校还积极推进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等建设举措。

（五）驱动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服务水平增强

技术技能创新服务是高职学校除了人才培养核心任务之外的第二个重点任务。长三角“双高计划”学校对接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校企共筑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不断提升技术技能服务水平。“双高计划”校企合作展现新作为，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度大幅提升。

二、长三角“双高计划”校企合作的主要困境

长三角省域层面及 41 所学校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校企合作经验、特色做法和可资借鉴推广的标准与范式。但是在当前区域一体化向纵深推进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机遇下，长三角“双高计划”学校校企合作在制度创新、突破性探索、平台运行和高层次人才引育等方面仍然存在困境。

（一）制度创新与满足产业企业合作诉求之间仍有差距

通过“国家—省域—学校”三层制度体系构建，长三角校企合作政策制度架构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但仍需加强制度创新，出台更多深层次、针对性的校企合作制度举措，以满足服务产业发展和企业合作诉求。省域层面，在落实一些具有突破意义的校企合作政策上还不够到位，一些专项项目的全方位一站式配套制度有待完善，适应多元主体参与办学或参与校企合作的机制还需健全。比如，对于校企合作中会出现学校提供场地、企业提供技术和资金等情况，涉及场地、资产评估等相关审批流程尚无具体可操作的细则；对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办学、企业投入资金设备参与办学中的国有资产处置和流失等问题，虽然制度上有条款明确，但在实际项目申报、具体实施中并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程序和标准，尚没有成熟的案例，财政、土地部门多轮反复，最后仍然面临流产。学校治理层面同样存在制度创新不足，比如，目前长三角高职学校受教学资源、师资等因素影响尚没有实行完全学分制，实际上并不能更好地满足现代学徒制弹性学习、工学交替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积极性。

（二）满足产业需求侧深层次需要的突破性探索有待加强

客观地说，满足区域产业需求侧深层次需要的突破性探索还需进一步努力。比如，国家层面提出“通过探索购买服务、落实税收政策等方式，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按相关规定落实税费政策”等要求，但落实起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需要财政、金融、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联手操作，中间一个环节没有打通就很难兑现，导致已有政策不能很好落地生效，校企合作面临的部门利益、行业壁垒仍旧存在。41所院校在产业学院建设深化、混合所有制实践创新、协同创新中心持续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在文本

中体现较少，成效不明显。总体上，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深水区问题从上而下均没有实现很好的重大突破。

（三）综合性平台高效能持续运行机制尚需完善

通过对 41 所学校职教集团（联盟）、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产教综合体、产业学院等典型平台的分析研究发现，从面上看，校企合作参与主体、功能定位、服务面向、建设路径等都有较大程度增强，但在平台运行机制和效能上提升空间还较大，尤其在创新性成果、关键性技术应用、服务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等深层次的合作领域并没有彰显平台的高层次、高水平、跨区域、跨领域优势，未能形成基于良性合作博弈的长效机制。

（四）高层次人才对校企合作的支撑效应略显不足

总体来说高职学校高层次人才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高职学校技术研发服务能力受到制约，高层次人才对校企合作的支撑力度不足，不能破解产业发展需求与高职学校技术服务供给不匹配问题。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政策受地方财政约束，地域、学校差距明显，不同建设档次学校的吸引力呈现差异化，“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以及非“双高计划”学校的人才引进和培育经费相对匮乏。企业高层次人才交流举措不多，比如产业教授的柔性引进问题，虽然江苏省率先出台了相关选聘办法并开展了遴选认定工作，但总体来说校企高层次人才交流实践缺乏。

三、长三角“双高计划”校企合作的推进策略

代表高水平高职教育的长三角地区，在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的后续征程中，责无旁贷地需要直面校企合作中尚且存在的困境，剖析困境产生之原因，采取有效策略优化与推进，发挥制度创新优势，更好地担当突破职教改革瓶颈、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历史重任。

（一）一以贯之、因地制宜完善纵向递进横向联动的支撑制度

长三角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各层面尤其是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理念认识和参与意愿更加理性、客观、长远、包容，龙头企业、领军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相对较强，产业界对先进技术、先进模式和治理方式的创新和应用意识也更强，加快构建高效能的沟通治理机制和政策兑现机制有利于吸引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纵向维度应更加明确厘清国家、省域、学校在制度设计和举措方面的职能，形成整体到局部、宏观到微观的递进式制度体系；横向维度应更全面系统地加强财政、土地、工商、人力、教育各职能口子的制度衔接和联动。省域层面应侧重对国家顶层制度的落实具化，尤其要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和地域生态差异，避免纲领性“克隆”国家文件，强化以区域为单元同步实施产业规划和职业教育规划。学校层面应有效融合职业教育规律和企业生产规律，紧跟专业和产业研发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细化校企合作制度，全方位纾解校企合作的现实梗阻，保障各环节畅通有序。

（二）立足自身、放眼大局在彰显特色上开展突破性创新

长期性、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产出供给是企业持续深入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源，也是校企合作能够持续深入的关键所在。为了更好地满足区域产业需求侧深层次需要，实现突破性探索，应该注重发挥长三角一体化联席会议作用，着力解决制度供给的暂时性滞后问题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的难点、痛点、堵点。长三角41所学校校企合作条件整体都在全国中高位水平，但省域与省域、学校与学校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性。此外，不同行业背景和专业布局的学校，校企合作的模式、内涵、特色各有不同，还需遵循“立足自身谋发展、发挥优势强特色”的原则深

化合作。比如，结合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江苏园区经济成熟、安徽县域经济动能强等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特点，将学校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有选择地在重点领域、优势方面走出学校特色，形成经验和样本。

（三）强化顶层、整体推进跨区域综合性高层次平台建设

以综合性平台、一体化项目为载体，打破区域、城市物理空间，发挥资源集聚效应，遵循资源集约原则，整体打造技术技能创新平台、职教集团（联盟）、产教融合大数据平台等能够服务区域、支撑产业发展的合作平台。发挥好“双高计划”学校、产教融合型企业的主体作用，以产业、领域、地域、专业等为单元多维度、多层次打造校企合作平台，抓住“创新”和“高质量”两大关键，形成省域实践、企业实践、学校实践的经验样板。对跨省域的职教集团（联盟）、创新中心等区域性、共享性的平台、载体、项目在省域层面进行单项资助并进行绩效考核。建立健全评价监督考核机制，以综合性专项形式加大财政投入拉动行业企业参与，关注产出和绩效，将重大项目推进成果作为对政府、对学校的绩效考核和企业政策兑现的依据。

（四）持续深化、勇于探索高层次人才引培的区域实践

高层次人才是“双高计划”学校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的关键，对于地处经济发展活跃度高、创新能力强的长三角地区的高职学校来说，特别要重视高层次人才引培工作。用创新性思维出台相关政策，深化高层次人才柔性引进、双向交流工程，在省域层面建立高层次人才师资共享库，完善配套制度，持续深化博士入企、产业教授入校的具体实践，形成高层次人才引培的区域实践经验和标准。学校层面用足政策工具，通过专项形式对高层次人才进行专项扶持，为

高层次人才搭建留用和服务平台。

高质量校企合作是推动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和区域产业发展进程正向耦合的关键环节。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线的创新发展模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突出地位无可置疑，也将在“双高计划”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延续。展望未来，长三角“双高计划”学校终将克服现存问题并积极推动校企合作走向更加深入，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提供更高水平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在服务与助推区域产业发展中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区域实践经验，为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支撑。

（引文出处：王安安.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成效与推进策略——基于长三角 41 所学校校企合作中期建设进展的分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3):28-34.）